

浅谈周族史诗是否可以被称为史诗

(一组 穆艳芳 2012214186)

摘要：在西方史诗的盛名之下，东方史诗明显呈现出优秀作品数量少、影响力不够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除了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外，汉族史诗几近于零，更有学者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个篇章，讲述了周民族发生发展、迁徙的历史，可以被纳入到史诗的范围。本文同样以此五个篇章为例，试析周族史诗长期居于史诗研究之外的原因，浅析其是否可以被称为史诗。

关键词：固有模式，先入为主，原始眼光

一直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形式中缺少史诗。黑格尔曾提出“中国无史诗论”，在他的《美学·第三卷》中，他说“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得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种大障碍。英国的波拉说中国充其量只有“前英雄诗”或是“哀歌”等，把中国楚辞中的《国殇》等说成只是哀歌而称不上史诗。[1] 哈佛大学海涛华等一批西方学者赞同这种看法，他在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中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可以看到欧洲文学中除了史诗之外的所有重要文类。” [2]。

应该说，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对中国早期诗歌的固有理解模式

一直以来，中国诗歌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表情达意上，以寥寥数字表达深蕴之情感，审美倾向于“言有尽而意无穷”，写意胜于叙事。“诗缘情”，“诗言志”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家提出并一以贯之的诗学审美模式。对于诗歌，尤其是中国诗，情感总是第一位的，叙事、描写等大多是为了抒情、言志服务，中国诗人是这样写的，也就形成了对中国诗歌解读的固有印象和模式。事实上，中国诗歌，包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三百》也不例外。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这些史诗之外，在西周后期的《小雅》中也有一些类似史诗性的叙事诗，如《出车》记周宣王时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写周宣王亲征徐夷，《采芣》、《六月》记周宣王时同蛮荆和玁狁的战争等等。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把这些诗篇排列起来，甚至可以为西周以前及西周时期的历史理出一条线索。然而，虽然这些史诗是叙事之作，但由于其写作目的主要在于记述史实（包括被当作史实的传说）和颂扬祖先，有时候后者更甚于前者。因而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不甚重视。而且在《诗经》里面，叙事诗并不多，由此可见，从《诗经》起，中国诗歌就已经表露出不太重视叙事诗的倾向。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也是造成批评家们难以赞同中国早期存在可以被称为史诗的作品的的原因之一。

二．既成西方史诗对史诗观念的影响

西方典范史诗创作先于“史诗”的定义，可以说，“史诗”一词的界定原本就受到了西方史诗先入为主的影响。西方关于史诗的观念是建立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范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史诗的研究也是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诗学为范式的。以往的史诗研究多以欧洲为中

心，中亚、非洲、中国的史诗传统直到很晚才被纳入这一视野。在西方，对史诗的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他是以荷马的诗歌为典范的。比较研究表明，撇开美学特质，荷马的诗歌与其他传统中的那些史诗一样，都具有它们的独特性。最近以来，西方学者也认为以荷马史诗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一种局限，而不是一种学术灵感的来源。[3]这样看来，如果从根本上说，“史诗”这一概念的定义本就已经受到“成见”的影响，又何谈据此观照周族史诗呢？

就《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的内容而言，笔者认为完全符合史诗标准的。虽然从诗的体制来看，这五篇无法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但从以韵文的方式来讲述本民族起源时期的英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角度来看，这几篇就具有了史诗的品格。

从题材上讲，《生民》讲述的是周民族的始祖后稷的生平故事。后稷的母亲姜嫄在野外行走，看见地上有大脚印，就踩上去，内心受到震动，之后就怀孕生了后稷，而这大脚印实际上是神的足迹。后稷长大之后，擅长稼穡，教会族人耕种，族人于是能安居于邠地。《绵》写古公亶父率周部族再次由豳迁至岐（今陕西岐山县）之周原，划定土地疆界，开沟筑垄，设置官司、宗庙，建立城郭，创业立国，并叙及文王的事迹。《皇矣》先写太王、王季的德业，然后写文王伐崇伐密胜利的经过。《大明》先叙王季娶太妊生文王，文王娶太姒生武王，然后写武王在牧野大战。五个篇章写了西周开国的历史以及发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稷的神异降生，“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充满了神话色彩和艺术魅力，虽然规模比不上荷马史诗，但从题材上讲，已经具备了民族史诗的特点。“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从创作手法上看，周族史诗同样地具有叙事纪实的特点。如《生民》，全用赋法，不假比兴，叙述生动详明，强于纪实性。其他几篇也大多如此，叙事性很强。事实上，郭绍虞在对《诗经》的解读中，就提出《诗经》的三体三用可以再作发挥，成为三种文类：

自风谣以进于诗，于是自此三种混合的质素趋于分别的发展：由语言的质素以演成史诗（即叙事诗），由音乐的质素以演成乐诗（即抒情诗），更由动作的质素以演成舞诗（或剧诗）。旧时把《诗经》分成风、雅、颂三类，我们若从大体上观察，则雅近于史诗，风可以当抒情诗，而颂字训容，又相当于剧诗。[5]

通常认为，史诗至少应当符合下面的八个尺度：（1）诗体的或散韵兼行的；（2）叙事的；（3）英雄的；（4）传奇性的；（5）鸿篇巨制或规模宏大的；（6）包容着多重文类属性及文本间有着互文性关联；（7）具有多重功能；（8）在特定文化和传统的传播限度内。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以一种更为原始的眼光去看待史诗，周族史诗也可以被纳入到史诗范围内。

参考文献：

[1]杨牧，论一种英雄主义 [J]，中外文学，卷4第Ⅲ。

[2]James Robert Hightower，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 Oregon, 1953.

[3]尹虎彬, 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1期.

[4]钟敬文著, 赵秉理编., 史诗论略, 格萨尔学集成〔第一卷〕[M],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0年, P581-586.

[5]郭绍虞, 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P15.